

斯文

朱洪涛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出过一本名为《清华暑期周刊》的刊物。这份刊物1932年创刊,1936年停刊,存留时间并不算长。《清华暑期周刊》在1934和1935这两年办了一个“教授印象记”专栏,刊发一系列文章谈教授风度,主要撰稿人是清华校内学生,但文章一般不署名抑或署笔名。文字篇幅短小,写法轻松灵活,文风亲切自然。因为是即时描写,且描写对象是上课的师长,字里行间没有隔膜和生疏,没有过分美化,情感流露真实爽利,读来使人忘倦,好似《世说新语》一般。这些清华学生的写法一般都会集中于教师讲课状态的描写,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我却特别关注学生笔下老师形容样态的描写,这些似乎更有趣。

史学系的雷海宗讲课一向受学生好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对雷海宗惊人的记忆力有十分形象的描写。这位学生笔下的雷海宗此时不过32岁,大约是在某个冬天的上午,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一百多人,窗外狂风大作,大家都在等着雷先生的出现,请看他的出场:“一件棉衣在风中飘荡得举了起来,项上的围巾圈得也真紧,又要赶路又要与风抗争,挟着个皮包斜着身子那末急急的走是真要上点儿劲的,然而他终于走进课堂了!于是他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也没功夫管这些,你看,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雷海宗讲课“轻快,流利,生动”,能让枯燥的历史在学生心中活跃起来。看来雷海宗在西南联大时期颇受学生欢迎,其实早在清华这一时期已经种下了种子。

史学系另一位教授陈寅恪在学生笔下是这样登场的,待铃声响起,大家就会

看到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套着蓝布大褂青布马褂的先生,“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低。”陈先生在这位学生眼里相貌毫不起眼,甚至感觉有一丝古董气息,于是送给陈寅恪这样一个称号:“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不过这位学生的写法很明显是欲扬先抑,最后他在和同乡聊到谁是清华园最好的教授这个问题时,大家异口同声回答:陈寅恪。

陈寅恪的好朋友、多情的吴宓在学生笔下的形貌却是如此:吴宓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的禀赋,恢奇的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像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的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灰——这些都装在一个大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这位学生引用了China Critic上的这段描写后下了一句评语,说吴宓是“一见后使人难以忘怀的那种面相”。只要见过吴宓本人,相信会终身留有印迹。学生说吴宓住在工字厅后面,居所附近有丁香花和紫藤花的香气,很适合这位“多情而孤单的书生”长居于此。但吴宓让学生佩服之处是他以一人之力持久办《学衡》杂志,抗衡新文化,显出自家的学术理想与旨趣操守。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湖南人蒋廷黻是“矮矮的身材,圆圆的面庞,微黑的皮肤,走起路来两只眼睛是从一副托力克中透视看前方”。蒋先生善于讲话,滔滔不绝的言语之中总透露着一点儿湖南口音。他讲到中国历史总不忘告诉学生要是研究的话最好用西洋史学方法作有系统的实地探究,而不要为考据而考据。蒋廷黻志气远大,锋芒颇露,给学生说清华是一

个小地方,鸿鹄总会远走高飞。果然蒋廷黻后来从政了。

写中国哲学史后来居上的冯友兰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与一位学生见面了,学生留下了亲切的回忆,说那天的大礼堂内“堆满”了开开心心的人们,台下坐着百十个教授上千个学生,冯友兰在师生们的目光中缓步走上了主席台,“短短的身材四十上下年纪,穿的是衬色的蓝布大褂裤儿半新半旧的青布鞋,讲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的毡帽,偶而沉默的面孔,颇缺乏生动的表情,鼻梁骨上架着一副玳瑁墨边眼镜,更显得态度万分端静而严肃,一头乌黑的发乱蓬蓬地”,冯友兰讲起话来,声音低沉舒缓,有时口吃会把脸憋得通红,还有那口地道河南腔的国语让人印象难忘。这位学生很明显是冯先生的拥趸,在文章结尾他写道,当我们想起冯先生的面容,定然能促使我们去思考“人生三问”:人生是什么,人生为的是什么,人生之意义何在。

在坊间名气甚大的金岳霖在学生眼中有很高的评价,那就是只要初见之下便可知他是哲学家。金岳霖的“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沿务求其下,好遮他眼前的光。有时候西装外面套一件大褂,有时候大褂面又套一件棉袍。这都有理,不是乱来的”。金岳霖走起路来总是慢慢悠悠,手中常常拿着他的“教授皮包”,口中常常含着纸烟,烟瘾甚大,不到一小时必抽一支烟,因此但凡有考试监考,金岳霖总会溜出去吸一吸。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总会以怀疑的态度看人看事,常会发出“靠不住吧?”的疑问。

一位崇拜刘文典的学生在未见刘文典之前先把他的相貌想象了一番,“架高鼻梁眼镜,御阔袖长袍,而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当年这位学生考进清华上大一国文时没选俞平伯没选杨树达,单选了刘

文典,等到见了真人,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走进来了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教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这段描写难免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学生之所以大失望是他满怀着强烈的期待。但后来学生发现自己看人太浅了,接触久了发现刘文典是一位性情恳挚、学问渊博、爱国情切的好教授。所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实在是罪过。

清华经济系的陈岱孙,出生好,学历高,相貌俊朗,若是西装上身,再配上高筒皮靴,简直堪比明星。“个儿高高的,洋服顶挺,走起路来常常带一根司的可(笔者注:手杖),有着一副英国绅士的仪态。”陈岱孙是福建人,但国语讲得相当漂亮,在学生那陈岱孙收获了压倒性好评,“无论谁,只要上过他的课,便不能不赞叹陈先生的口才”,上他的课,“学生是没有一个敢作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

这些清华教授在学生笔下形态各异,相貌是有好有坏,穿着打扮各异其趣,有人古典有人现代,有人不修边幅满不在乎,有人装点修面英姿笔挺,不过共同之点是皮囊则一,灵魂有味,学问好。若无后者加持任他如何打扮如何修饰,惟庸碌而已。宋代理学家好用“气象”形容人之气度,说某人学问深人品正便谓之“气象好”。清华的教授先生们当得起气象好的评价。

我的恩师严家炎先生

吴宝三

近日,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邀请函,邀我参加为严家炎先生举办的“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暨座谈会”。《邀请函》写道:“严家炎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教育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领军人物,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2014年起,严先生陆续将上万册藏书、书信、手稿以及书房家具、名人字画等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些人藏资料数量壮观,涉及面极广,丰富了我馆馆藏,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手捧邀请函,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禁不住想起受严老师教导和影响,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几件事。

严家炎先生是我最尊敬、最感亲切的恩师,没有之一。我称他老师,他称我学弟。二十年前,我和范震威曾为严老师写过一部30多万字的《燕园风雨四十年——严家炎评传》,2004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我应是最了解严老师的学生之一。

我是1970年进入北大中文系的。高中毕业那年,我在县图书馆就见到过严家炎的名字,他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有关长篇小说《创业史》的三篇评论文章,引发一场大论战。1978年,严老师把这几篇评论文章收入《知春集》中,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

关于《创业史》的几篇评论均未做改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在某些观点上也许不是没有问题,有些措辞似嫌轻率,现在读起来有几分吃惊。”他没有标榜自己如何正确,这种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多么难能可贵。

严家炎先生名如其人、文如其人,无论做学问还是为人处世,一向严谨缜密,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被称为“严上加严”,向来一丝不苟。

我曾经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未名湖岁月》,写了北大中文系十位教授,其中有一篇《燕园吾师严家炎》。严老师读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集内散文都写得好,笔墨很活,人物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唯因时间较久,间或记忆稍有出入。”严老师曾写过一篇评论我诗歌的文章,我刚收到稿子,第二天又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昨天寄去的稿子,今天想想,在最后一句‘这就是我读吴宝三组诗《海滨抒情》得到的一些启示’之前,恢复被我腾写时删掉的别林斯基一段话较好。将‘这就是’改为‘这也正是’,这是因为,我并非你所说的‘名人’,而且也写不出‘名言’,还是借助这位大名人的话为好。”严上加严可见一斑。时任《北方文学》主编黄益庸亲自签发,转载了严老师评论我诗歌创作的这篇文章《我爱读这样的诗》,于是乎,我这个边



严家炎

远小城的业余作者,从这里起步,迈进了文学的大门。如果我有一点点创作成果,得益于恩师,我是沾了严老师的光。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同严老师一直保持联系。他大约给我写过20几封信,还有评论我诗歌创作的手稿,我效仿严老师,连同一些作家、学者的书信,一并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化馆。

大学毕业后,我一有机会就去北京看望严老师,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像家人般相互问候。前些年,我每次去北大看严老师,他请我吃饭,大都选在北大南门对面的海淀饭庄。边吃边聊,不知唤起多少对艰难岁月的回忆,其中有欢乐,亦有悲伤。有时我

们全家来北京,在他家里吃饭,他还亲自上灶。

1985年盛夏时节,严老师应邀去山东讲学,回京的途中,特意转道去我工作的辽宁兴城看我。那时我的三个女儿还小,他给孩子们买了玩具,还特意给我带来一瓶青岛的葡萄酒。当提起孩子的名字时,严老师还记得,他一本正经道,我写给你的信中说,你女儿吴为、吴非,名字起得似有一点道家的味道。在相处的几天里,我俩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还是一起在京郊乡下开门办学的那些日子。因为我有胃病,我提起他曾给我买苏打饼干,给我邮寄胃药猴头菌片,他说记不得了,而我却没有忘却,恍若昨天。